



## 墨子用民思想初探

刘韶军 高山

**摘要:** 墨子民众思想的核心宗旨是君主如何用民,但以君主的爱民、利民为基础,可以称之为“用民”思想。墨子认为,君主要做到爱民利民、厉行节俭,使民无怨心,这才是值得提倡的君主作为。

**关键词:** 墨子;用民;利民;节俭

墨子提倡尚贤、兼爱、尚同、节用、非攻、节葬、天志、非乐等,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,仔细阅读墨子关于这些理论的论述,就会发现这些思想都与民的问题有关。也就是说,墨子的这些思想主张,一方面是为君主而言的,这符合司马谈提出的著名判断:“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,此务为治者也。直所从言之异路,有省不省耳。”<sup>①</sup>另一方面,则是为民众百姓而言的,这体现了墨子思想的人民性。而其关于民众的思想,又与务为治的整套理论融合为一,成为其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。

### 一、用民及其条件:民无怨心

《亲士》篇主张重士重贤,认为这对于君主来说,是国之珍宝,与此同时又提出用民的问题,以晋文公、齐桓公和越王勾践为例,说“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”,能做到“无败”或“败而有以成”,“此之谓用民”<sup>②</sup>。换言之,如果不能用民,三位君主不能取得成功,不能做到无败或败而有以成。在谈到君主亲贤用贤的问题时如此强调用民,表明墨子认识到了民对于君主、国家的重要作用。

墨子不只仅仅笼统地提到用民,他还进一步说到如何让民为君主所用:

吾闻之曰:“非无安居也,我无安心也;非无足财也,我无足心也。”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,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,内究其情;虽杂庸民,终无怨心,彼有自信者也。是故为其所难者,必得其所欲焉<sup>③</sup>。

这里强调安心和足心,这与安居和足财紧密相关。能做到这些,就能使杂庸民终无怨心而有自信,于是君主才能必得其所,也就是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。安心、足心、无怨心、有自信,这是用民的前提,没有这些,是不可能用民的,即民不可能为君主所用,民不可能为君主卖力。这中间有其理由,即民在此君主之国内,能安居安心、足财足心、无怨心、有自信,因此君主让他们做什么,他们都会认为这将有助于自己的利益,值得出力去做,君主也会因此而让民众得到应得的利益。墨子把这层逻辑说得非常清楚,这是他的用民思想的价值所在,值得后人借鉴。这一段原文中所说的“不败其志,内究其情”,正是指民的

①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 1998 年,第 1178 页。

②吴毓江:《墨子校注》,中华书局 1993 年,第 1 页。

③吴毓江:《墨子校注》,第 1 页。

志和情,君子即君主及其所用的贤士,他们应该懂得民众的心情和愿望,这就是安居安心、足财足心,并且保证让民众实现自己的心情与愿望,所以他们才会有怨心和有自信。这些言外之意,通过墨子这段原文应该能体会出来,于是墨子所谓的用民,就有了可靠的实践性,而不再是一种空谈,对于民众来说,才是一种可信的政治理论。

在《亲士》篇中墨子又说:

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,近臣则暗,远臣则谗,怨结于民心,谄谀在侧,善议障塞,则国危矣  
……王者淳泽,不出宫中,则不能流国矣<sup>①</sup>。

暗、谗都是不言,可以理解为不为治理好国家而进言,当然也就不可能为民众之事进言,就会造成上下阻隔,民众的意志与愿望得不到申诉,所以就会怨结于民心。这与前面所说的无怨心、有自信正好相反,再加上谄谀在侧,善议障塞,于是造成国危的局面。这说明要使民无怨心,需要贤人在位,尽忠进言,使上下畅通;也说明君主亲士用贤,其目的之一也是通过士人贤人而了解民情民心,以保证民无怨心,而能充分用民。若不能亲士用贤,自然就是小人在侧,谄谀障塞善议,民有怨心,最终不能保证用民。所谓王者淳泽,即君主的恩泽,也要流国,即遍布全国,使全国人民都受到君主的恩泽,而不是只限于君主身边的人,即所谓的宫中。这样做,也是要让民安居安心、足财足心、无怨心、有自信,从而使君主可以得民心而用民。

《修身》篇中,墨子说到好的君主治天下,要做到“怨省而行修”<sup>②</sup>,怨省就是让怨心减少,行修就是君主的行为修谨善正。《亲士》篇里阐明了要通过亲士用贤及广施恩泽而使民无怨心,这里则进一步说明君主自己要通过“行修”而使民无怨心。君主行修,表明君主值得民众信赖甚至是崇拜,所以怨能减省而不是日渐增多,具体说来,就是“潜慝之言,无入之耳,批扞之声,无出之口,杀伤人之孩,无存之心,虽有诋訾之民,无所依矣”<sup>③</sup>。潜慝之言、批扞之声,都是指民众对君主的批评抨击,此种声音不出于民之口,自然不会入于君主之耳。这不是堵塞之后的无入之耳,而是本来就没有批评抨击的声音,说明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状况都很好,所以不会有杀人伤人之人出现,这也与民无怨心和无批评抨击之声有关。这说明君主靠自己的行修可以达到使民众无怨心,具有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用。

## 二、为民的核心:爱民、利民

民无怨心是用民的前提之一,但仅此还不够,还应让民有足够的能为君主所用,这就需要让民富有。只有民富,国才能真正地富和强。如果财富都集中到国家和君主手里,民反而很贫穷,这样的国家也不能说是真正的富强。如果国富君富而民贫,则无论如何用贤和行修,也都无法让民无怨心和有自信。况且,君主把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,也称不上行修和用贤。

让民富有富足,首先要求君主能爱民和利民。爱民还只是思想上的因素,只有落到实处的利民措施,才能真正让民富有富足,这才是真正的爱民。对此,墨子也有不少阐述,如《七患》篇中墨子提出“国有七患”,其中第三患是“先尽民力无用之功,赏赐无能之人,民力尽于无用,财宝虚于待客”<sup>④</sup>,第七患是“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”<sup>⑤</sup>,这二者对于民众来说,都是灾难,国君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,其出发点就是爱民和利民。

《七患》篇又说:

凡五谷者,民之所仰也,君之所以为养也。故民无仰则君无养,民无食则不可事。故食不可不务也,地不可不力也,用不可不节也。……一谷不收谓之饑,二谷不收谓之旱,三谷不收谓之凶,四谷不收谓之匱,五谷不收谓之饥<sup>⑥</sup>。

①《墨子校注》,第2页。

②《墨子校注》,第10页。

③《墨子校注》,第10页。

④《墨子校注》,第34页。

⑤《墨子校注》,第35页。

⑥《墨子校注》,第35页。

这里所说，正是前面所说的“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”的具体表现，君主的爱民和利民，用民众的吃饭问题就可考验出来，口头上无论怎么说爱民利民，如果民众吃不饱饭，所说的爱民利民，就都是骗人的鬼话。所以墨子说：“食者，圣人之所宝也。”<sup>①</sup>而要让五谷丰登，则需要君主用各种政策和措施保护和促进粮食生产，这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地不可不力，二是用不可不节，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开源与节流并举。因此，观察君主是不是真的爱民和利民，也可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进行判断。

对此，墨子也有分析，《七患》篇说：

今有负其子而没者，队其子于井中，其母必从而道之。今岁凶、民饥、道饿，重其子此疲于队，其可无察邪<sup>②</sup>？

这是要求君主有爱民之心，如母亲爱其子一样，子有灾难时，母亲一定要尽力救之，民有灾难时，君主同样也要尽力救之，而不能无察，更不能知而不救。这是强调君必须有爱民思想。其下又说：“时年岁善，则民仁且良，时年岁凶，则民吝且恶。夫民何常此之有？”<sup>③</sup>这说明君不爱民，民也就不会爱君，从良民变成恶民。民对君的态度不是固定不变的，而是无常的，他们根据君主对民的态度而在不断改变。不爱民的君主，不要指望民众爱他、拥护他。墨子对此说得非常清楚，这种思想对于统治者来说，值得重视。

年岁的凶或善，不仅仅取决于自然界的风调雨顺，很多时候取决于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是否节俭或节用。故此篇又说：“为者寡，食者众，则岁无丰。”<sup>④</sup>这里的为，就是君主的为，疾指多而重，且对民众带有很强的逼迫性，即强行从民众手中征夺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“尽民力无用之功”、“民力尽于无用”。君主的奢侈与好大喜功往往会使得民力尽于无用之功，使民众为国家付出太多的赋税与劳役，从而使民众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破坏，使民众面临与年岁凶一样的局面，生活无法保障，甚至是难以为继。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，有许多实例，但君主们往往视而不见，仍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让民众陷于困苦。因此，也就造成了岁无丰的局面，而这不是因为自然界的灾害对生产的破坏，而是由于君主的不当举措造成的岁不丰。“食者众”，就是前面所说的“赏赐无能之人，财宝虚于待客”<sup>⑤</sup>。出现这种情况也往往是因为君主的好大喜功，热衷于表面繁华和虚假的繁荣。这都不是爱民和利民的君主应该做的。墨子为此指出了正确的做法，即《七患》篇所说：“故先民以时生财，固本而用财，则财足。”<sup>⑥</sup>以时生财，就是按照自然的时节时令让民众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，从而生产出粮食等财富。而这就要求君主不能违反自然时令来让民众从事无益于生产的劳役，如秦始皇的大修长城，后代不少皇帝的远征高丽等，都是这种违反自然时令的举动，破坏了民众的正常的生产活动，从而也使正常生产所能产出的财富变得越来越少，国家的开销日益蹙促，于是产生恶性循环，强行从民众手中征夺更多的赋税，以满足国家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。这都违犯了以时生财的准则，也是不爱民、不利民的举动。所谓的本，就是民众的正常生活活动，固本就是保障民众的正常生产。所谓的用财，就是合理地使用财富，“用不可不节”，而不是为了满足君主的欲望而奢侈地滥用民众生产出来的财富。这仍然是通过开源——以时生财而固本、节流——用不可不节的用财，来保证国家财富的充足，民众生活的富足，而这正是保障国家、社会和民众生活安定稳定的重要条件，谁都不能轻易违反之，更不能随意地破坏之。

正如《七患》篇所说：“苦于厚作敛于百姓，赏以赐无功，虚其府库，以备车马衣裘奇怪。苦其役徒，以治宫室观乐。死又厚为棺槨，多为衣裘。生时治台榭，死又修坟墓。”<sup>⑦</sup>这都是不合理的用财，都不能固本。这样的开支和用财，民众无论怎样生产，都不够挥霍和浪费。可知节流对于国家财政来说，是多么重要。如果君主这样用财，就会使“民苦于外，府库单于内。上不厌其乐，下不堪其苦”<sup>⑧</sup>。这样的国家与社会，哪里谈得上稳定与发展呢？而这一切都与君主不爱民的不爱民思想和不利民的措施紧密相关。

①《墨子校注》，第36页。

②《墨子校注》，第35页。

③《墨子校注》，第35页。

④《墨子校注》，第35页。

⑤《墨子校注》，第34页。

⑥《墨子校注》，第35页。

⑦《墨子校注》，第36页。

⑧《墨子校注》，第36页。

墨子说：“故虽上世之圣王，岂能使五谷常收，而旱水不至哉！然而无冻饿之民者，何也？其力时急，而自养俭也。故《夏书》曰禹七年水，《殷书》曰汤五年旱，此其凶凶饿甚矣。然而民不冻饿者，何也？其生财密，其用之节也。”<sup>①</sup>

就墨子看来，任何高明的帝王都不能保证不发生自然灾害，但靠君王合理而正确的政策与举措，仍可以保证国家没有冻饿之民。所谓的正确政策与举措，无非就是力时急和自养俭两条。力时急，就是生财密，就是地不可不力，就是以时生财，这一条可简称为固本，是开源的政策与举措。自养俭，就是用之节，就是用不可不节，就是以固本为前提的用财，这是节流的政策与举措。

### 三、爱民、利民：君主和贤士要实行节俭

以上论述都是墨子批评现实中的君主不能爱民和利民，并提出了应该在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使民富足，以保证国家的稳固与安定。在《辞过》篇，墨子则进一步说明君主在爱民方面的具体举措，如说：

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，就陵阜而居，穴而处。下润湿伤民，故圣王作为宫室。为宫室之法，曰：室高足以辟润湿，边足以圉风寒，上足以待雪霜雨露，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。谨此则止。凡费财劳力，不加利者，不为也<sup>②</sup>。

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先世圣王发明宫室等以利民生的传说，这是强调圣王的高明，使民脱离了原始的生活状态。在墨子看来，这种情况应该理解为君主的爱民。为民发明制定宫室之法，也要遵照节俭的原则，足以辟润湿、足以御风寒、足以待雪霜雨露、足以别男女，就够了，所以说“谨此则止”，若超过这个限度，就是费财劳力而不加利了，圣明的君主就不会那样做。这说明墨子的君主爱民思想与他的节俭思想保持一致，并不提倡让民众的生活走向奢侈，因为这样的话也会违反固本而用财的原则，也会造成财不足的后果。这一点，在理解墨子的爱民思想和节俭思想时，应该特别注意。根据这一思想，墨子强调说：“修其城郭，则民劳而不伤。以其常正，收其租税，则民费而不病。民所苦者非此也，苦于厚作敛于百姓<sup>③</sup>。是故圣王作为宫室，便于生，不以为观乐也。作为衣服带履，便于身，不以为辟怪也。故节于身，海于民，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，财用可得而足<sup>④</sup>。”修城郭、收租税，都要民众为之服一定的劳役、交纳一定的财物，但君主在征调民众服劳役和纳赋税时，要遵守节俭的原则，使民不至于劳而伤、费而病，这样的劳役与赋税就是合理的，必要的，能够得到民众理解和支持的。如果过度了，就是厚作敛于百姓，民众就会受苦了，也就不再理解和支持了，也就说明这样的劳役和赋税是不合理的，不必要的了。因此墨子在这里强调说任何工程劳役、制度赋税、租税，都要有度。这个度，就是便于生、便于身，或者如上面所说的：足以辟润湿、御风寒、待雪霜雨露、别男女，就要谨此而止，就不要超过这个度而进一步向民众征求和索取。君主遵守这样的度，是靠自身的节俭，所以说“节于身”，同时以自己的这种节俭行动，来教育民众，所以说“海于民”。这又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。后人所说的上行下效，也来自于此，上行节俭，下就效法节俭，上行奢侈，下就效法奢侈。前者形成整个社会的勤劳生产与节俭，后者形成整个社会的享受与奢靡，国家的财用足不足，由此决定。君主奢侈还容易维持，因为它用整个国家的财富来支撑的，如果全体国民都奢侈起来，则国家的财富肯定无法支撑。也就是说，民众不可指望像君主那样长期享受奢侈生活，很快就会陷于财用不足，而走向贫穷困顿。在墨子看来，只有上行节俭，下亦效法之，这样的国家和社会中的民众才能过上好生活，也就是墨子所说的“天下之民可得而治，财用可得而足。”<sup>⑤</sup>

但是，现实中的君主往往不能按墨子所说的那样来控制自己的欲望与消费，而是相反，即墨子所说的：“当今之主，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。必厚作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、青黄刻镂之饰。为宫室若此，故左右皆法象之。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，振孤寡，故国贫而民难治也。君实

①《墨子校注》，第35页。

②《墨子校注》，第44页。

③《墨子校注》，第36页。

④《墨子校注》，第45页。

⑤《墨子校注》，第45页。

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，当为宫室不可不节。”<sup>①</sup>这不仅是墨子当时之主的做法，也是历代君主普遍的行为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奢侈生活和享受，不顾民众的痛苦，不行节俭，只知索取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民众不堪忍受其苦，如陈胜吴广一样起而诛暴秦了。

墨子分析说，人在生活享受方面会分出圣人与小人，圣人的特点是“俭节”，小人的特点是“淫佚”。两者导致的结果也截然不同：“俭节则昌，淫佚则亡”<sup>②</sup>，所以为了国家、社会和民众的长远利益与幸福，君主必须在生活与相关制度的各个方面“不可不节”：“夫妇节而天地和，风雨节而五谷孰，衣服节而肌肤和。”<sup>③</sup>由此可知，墨子所说的节俭，不是单纯限制君主的享受，而为出于爱民利民的目的，把君主的节俭视为爱民利民的必要条件，并且一再强调君主不能节俭，也就不是真正的爱民利民，也就不能使国家、社会、天下达到真正的繁荣昌盛，也就会在暂时的表面的繁华之后不久走向灭亡。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，对此是毋庸置疑的。这也证明了墨子思想的合理性和正确性，我们今天重新来读墨子的著作，仍然不能不从中感受到其思想的伟大力量。

#### 四、结 语

通过对《墨子》部分篇章的简单分析，可以看出墨子思想体系中的用民思想占有重要地位。这一思想至少包括三个方面：一是要用民，二是要爱民利民，三是爱民利民要与君主的节俭相配合。君主的一切作为，都离不开用民，不可想像只靠君主或他身边的少数人，就能成就大事。但要用民，就要爱民利民，否则民不会为君所用，或被迫为君所用，也只能激起可怕的后果，而这是君主所不愿看到的。如果君主懂得爱民利民的重要性，那他就要从自身的节俭做起，控制自己的享乐欲望，不要好大喜功，不要妄自尊大，通过自己的节俭来教育人民，在上行下效方面收到好的结果。总之，在用民、爱民利民、节俭方面，君主都是居于主导地位的，这表明君主不能指望别人来规定自己怎样做，而只能通过君主自身对这些问题的认真思考而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，并且自觉地来这样做。在这里，民众似乎是被动的，无可奈何的，但君主如果不顾及民众的愿望与感受，最终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、理解和支持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最初的民众之不满，可能微不足道，但积聚一个时期，达到一定数量，爆发出来的力量，就可以掀翻任何貌似强大的君主及其手中的暴力工具，到这时，君主的灭亡之时也就不会太远了。所以，民众的拥护，是君主在巩固统治、企求长治久安时所不可轻视、忽视的重要因素。君主要想治好国家、社会和天下，必须在如何对待民的问题上慎重思考，为此有必要借鉴墨子的用民思想，从中受到有益的启发。墨子的用民、爱民、利民、节俭的思想，其中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，不能分割来看，其中的论述和分析，不只对于古代的君主有其价值，就是对于现代国家和社会管理者来说，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而这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■ 作者简介：刘韶军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；湖北 武汉 430079。

高 山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博士生。

■ 责任编辑：桂 莉

①《墨子校注》，第45页。

②《墨子校注》，第47页。

③《墨子校注》，第47页。